

“比较成本论”笔谈

编者按

“比较成本论”在我国经济理论界长期被视为禁区，被批判为“伪科学”。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研究经济理论空气的活跃，对“比较成本论”是否有科学的内核和是否应予重新评价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引起了经济和贸易理论研究工作者的重视，纷纷发表文章，各抒己见，颇为热烈。

对“比较成本论”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如果认为“比较成本论”含有科学的内核，这个内核是什么，它能否用来为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果服务。

本刊作为一个研究对外贸易的学术刊物，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开展学术探讨是有意义的。为此，我们组织了这次笔谈，邀请一些对研究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和外贸工作者参加，各抒己见，以求对这个问题获得更明确的看法。

国家进出口委员会 季崇威

应用“比较成本论”指导我国对外贸易， 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过去，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左”倾思潮的支配下，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论”，予以全面否定，称之为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服务的反动理论。迫使这一理论成为一个禁区。最近有些理论界同志提出要重新评价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吸收它的科学内核，来指导我国的对外贸易，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百多年来，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比较成本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但始终脱离不了李嘉图“比较成本论”的基本观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企业管理和文化教育等因素在发展经济上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这些都已成为生产的要素。当前世界各国拥有的生产要素千差万别，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在某些生产要素方面拥有经济优势，而在另一些生产要素方面处于劣势，如美国的先进技术是优势，劳动工资高昂则为劣势；我国的劳动力众多、工资便宜是优势，而技术和管理落后则为劣势。这种生产要素的优势和劣势的综合，形成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经济，即所谓“劳动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等。各国生产要素的差异和各种类型经济的不同，便是当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当前各国政府，正以“比较成本论”为指导，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各种经济贸易政策，力求加强本国出口商品的优势地位，削弱他国竞争商品的优势。各国的对外贸易企业，都竭力利用自己的商品优势，调查世界市场的情况，选择最佳的

推销策略，从而形成“市场学”的理论。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日趋国际化的情况下，“比较成本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比以往时期更具有指导作用。现在一个国家如果要进行现代化的大生产，它必须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使其大工业生产所需的或过剩的原材料、产品技术设备和资金等，可以得到国际间的相互调剂。以钢铁、机械工业为例，即使象美国、日本等钢铁工业很发达的国家，也无法达到所有的品种、规格都自给自足，而是按照价值规律的支配，既出口某些可以发挥本国生产优势的品种、规格，又进口那些自己生产上处于劣势的品种、规格。这样相互调剂，对各国都有好处。

发展国际贸易，可以达到迅速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这是经历了一百多年来国际贸易实践检验过的理论。当然，“比较成本论”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如它把国际分工的形成说成主要是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忽视了科学技术、管理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提高等因素，它还掩盖了各国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措施等社会条件对国际分工所起的重大作用。“比较成本论”曾被当年英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用，作为制定自由贸易政策的基础。但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则利用这个理论为其对外扩张政策辩护，建立殖民地体系，把落后国家变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销售市场，通过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从中攫取高额的利润。这是“比较成本论”被反动的帝国主义利用的一面。但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武器，我们同样能够利用它来为我国的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服务，不能因为它被帝国主义利用过，就否定这一理论的科学合理性。只要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方针，统一对外贸易的管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可以利用“比较成本论”的合理内核，积极参加国际分工。我国有不少有利条件，如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众多，工资低廉，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等等，当然也有一些不利条件，如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工业组织程度和机械化程度低，劳动熟练程度和工作效率低，有些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阻碍对外贸易的开展等等，我们要充分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对我国的进出口商品及国际市场进行调查研究，排队摸底。搞清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发展趋势，计算出每种出口商品的创汇率，换汇成本和盈亏状况。对具有绝对优势的出口商品，如手工业品，某些农副土特产品，应充分发挥其优势，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如我国抽纱是手工艺性的劳动，可以利用农村妇女劳动力编织，成本低廉，每美元换汇率二点七八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和我竞争。近年来出口量每年增长百分之二、三十，去年出口金额达四亿美元，全国二十省市以此为生者已达三百五十万人。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出口商品。我们应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如羊毛衫在美国市场上每件售二十八美元，我国机织羊毛衫每件工资只需七、八角钱；而欧洲、美国制造羊毛衫的工资则要高得多。其他象服装、鞋子等劳动密集的商品都有同样情况。我国煤炭资源的储量丰富，初步探明达六千亿吨，现在的成本价格每吨只有二、三十元，而国际上煤炭售价达五十美元，即使运输费较高，出口煤炭对我还是很合算的。钨砂国内的收购价每吨八千多元，而国际上售价则达九千多美元，如将纯度提高，还可多卖钱。所以我国应争取多出口这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我国机械工业已有一定的基础，有些机械产品，既是技术密集性，又是劳动密集性，出口也较为有利。如上海机床厂的精密磨床，质量好，每台成本一万元的磨床，出口到美国，可卖到一万多美元。又如电子产品，所耗劳动量较大，现在我国不少厂为国外厂商搞来料装配。如果把元器件的专业化协作生产组织好，今后民用电器的出口也是有发展前途的。

总之对这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出口商品，只要我们努力改进，扬长避短，就有发展前途。有些产品如一般的玻璃器皿，耗能源大，成本高，运费占售价的百分之四十，换汇成本又高，就不宜多出口；从进口商品来说，也有一个扬长避短、改进结构的问题。近年来，我们进

口的商品中，农产品、工业原料如粮食、棉花、糖、化纤等比重大大提高了，特别是进料加工的比重，去年占到出口货源中的百分之四十二；钢材、化工、机械等工业品进口的比重趋势则在下降。在我国农业尚未上去，粮食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多进口些粮食是必要的，也是合算的，因为从各种农产品的国际价格来看，由于粮食适合于大规模的机械化，如美国、加拿大的粮食成本价格相对的比经济作物低。所以目前进口些粮食，扶植经济作物的发展，方针是正确的。但象棉花、糖、烟叶等经济作物，国际价格较高，进口需要国家大量补贴，今后应努力增产自给，逐步减少以至停止进口。据计算，在上海郊区，一亩地种小麦的收入，按国际价格只值三十二美元，种青刀豆，可得二百六十四美元，种大蒜可得六百美元。所以我们一些沿海城市是否应当考虑多种一些国际市场上需要的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加工出口，换回更多的粮食。这也是运用“比较成本论”指导改进我们进出口结构中需要研究的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 吴大琨

关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社会主义的四化，如果没有一整套有关对外贸易的理论、政策，乃至为了发展对外贸易而采取的战略方针、战术措施，那是肯定搞不好对外贸易的。从理论的原则上来说，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理论应该是早就明确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外贸理论。困难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外贸理论，马克思并没有这么一本专著来讲这个问题。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和其它的一些著作里，讲到对外贸易理论的地方，也还是不少的。从《资本论》里看，马克思不赞成李嘉图的对外贸易理论——就是所谓“比较成本说”——是可以肯定的。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都是古典派的经济学家，是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彻底，他并不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也能适用于对外贸易。正因这一点，所以反对劳动创造价值论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是对李嘉图的外贸理论很欣赏的。他们非常赞赏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一直到现在，在塞缪尔逊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还在热心提倡“比较成本说”，作为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制度的“理论”根据。可是马克思是对李嘉图的这种学说加以批判的。按照李嘉图的学说，任何国家只要从事对外贸易，就可以引起所谓“国际分工”，而只要按照“国际分工”的原则去从事对外贸易，即使是对只输出初级产品的经济落后国家，也是有利的。事实当然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和其它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事务一样，是有二重作用的，对于有些国家可以有利，也可以不利，对于不利的一面，李嘉图完全没有注意到。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第五节讲《对外贸易》这一节中就明确地指出：“李嘉图完全忽视了对外贸的这个方面”（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64页）。马克思认为“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是那些可以“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的国家，“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同上，第265页）。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如果长期进行对它有利的对外贸易，当然国家就会富起来；反之，处在不利条件下的国家，如果长期进行对它不利的对外贸易，当然国家就会穷下去。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说得很清楚：“怪不得自由贸易的信徒并不懂得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09页）。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自由贸易”，已经

进行了几百年，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就看到了有两种国家，一种国家，即所谓“资本发达国家”很富，而另一种国家，多数第三世界中的非石油生产国，则变得很穷，而且越来越穷。这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市场，实际上是被控制和操纵在“资本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手里的，它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通过对外贸易——当然也还有其它的渠道——对广大的第三世界进行剥削和掠夺。现在觉醒了的第三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反对由少数“资本发达国家”所控制、操纵的国际经济秩序，主张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当前国际间的一场重要而尖锐的斗争。我们国家是参加这一斗争并支持这一斗争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从去年九月，去联合国参加第十一届特别联合国大会的经过情况来看，我们在这一方面，应当做而还没有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例如，我们就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贸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贸易工作。先把我们从事外贸工作的干部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贸理论武装起来，就是参加这一斗争的先决条件。今天，在国际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外贸工作的已经有若干种著作，很值得我们参考（注）。例如，原籍希腊，现在巴黎任教的伊麦努埃教授（Arghiri Emmanuel）就曾在一九六九年用法文出版过一本名为《不等价交换：关于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的著作，这书的英译本在一九七二年出版后，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在西方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论战，至今还未结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会引起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批判，那是毫不希奇的，但这书也同时受到了“左”的方面攻击。对于这本书和它所引起的论战，就很值得我们来加以介绍。现在这书，由于外贸出版社的重视，已经决定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同志组织力量来加以翻译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我十分希望这书能早日出版，使它能和广大的外贸工作者见面。我相信，我们的外贸工作同志只要读过一些这样的著作就会知道今天我们大力提倡发展对外贸易，使我们的国家真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富强起来，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贸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而改用什么“比较成本说”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工作，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注）除伊麦努埃教授的《不等价交换》一书外，还有萨密尔·阿明（Samir Amin）的著作《世界规模的积累》（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以及麦克·林德（Marc Linder）的《反塞缪尔逊论》（Anti—Samuelson）等著作都值得介绍。

天津财经学院 陈寿琦

对于应用“比较成本理论”的看法

“比较成本理论”是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我们之所以要应用它，不外因为它有可用之处，或者说它有一定科学性，象学术界称作合理内核的东西。因而，它的合理内核何在，是问题的一个关键。

有些同志认为：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合理内核在于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说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比较成本理论”自身并不具有合理内核，它的合理内核是一种身外之物所赋予的，离开这个身外之物，合理内核势必化为乌有，而变成一堆糟粕了。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认为“比较成本理论”的合理内核——“相对优劣思想”是这一理论的核心，而不是它赖以建立的基础。离开原先基础，换个其它什么基础，仍然成其为“比较成本理论”，如离开“相对优劣思想”这个核心，就不成其为“比较成本理论”了。譬如，现代比较成本理论——生产要素

禀赋比例理论，是建立在机会成本说的基础之上的。它放弃了劳动价值说，基础变了，但核心并没有变，仍然是“相对优劣思想”，也就仍然具有合理内核。否则，从我国国情出发，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扩大出口，便是错误的了。

“相对优劣思想”就是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思想。各国出口生产处于优势、成本相对低的产品，进口生产处于劣势、成本相对高的产品，通过分工与交换，充分发挥本国优势，充分利用外国优势，彼此同获利益。

以“相对优劣思想”为核心的“比较成本理论”，是李嘉图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的。当时各国生产力差距还不大，某些国家工业生产力高，另一些国家农业生产力高，基本是互有绝对优劣的状态。他预见到差距将越来越大，即使某些国家工农业生产力都高，另一些国家工农业生产力都低，如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形成互有相对优劣的状态，两类国家之间仍然可以进行互利贸易的。这对于发展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很有现实意义。

这里引起另一个问题：“比较成本理论”究竟与实际是否相符？

西方少数经济学家为验证“比较成本理论”，在不同时期，曾从劳动生产率、工资、成本与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角度，对某些国家对外贸易进行剖析，结果，并无一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现实贸易与“比较成本理论”揭示的方向相符，甚至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竟然是反“比较成本理论”之道而行之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不相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比较成本理论”有一系列的假设或前提，如国际间生产要素自由移动，市场上完全竞争，国家政权对贸易不加干涉以及充分就业等等，而现实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这就造成贸易与理论方向不符。

另外，国际贸易并不完全决定于生产的优势与劣势或成本的差异。各种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社会等因素都对现实贸易发生影响，而且往往是极为强烈的。各种类型国家，为了不同目的，都采取各种管制、保护贸易措施。往往对成本低的外国产品限制进口，对成本高的本国产品鼓励出口，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阻碍贸易照理论揭示的方向发展。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很难设想，贸易商品总是由劣势国家流向优势国家，由成本高的国家流向成本低的国家。在千千万万国际贸易商品中，总是有那么一部分，它们的流向又是与理论揭示的方向相符的。这正是“比较成本理论”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反映，也是我们能够加以应用的客观依据。

由此可见，假如应用“比较成本理论”指导对外贸易，要使一国贸易的总趋向符合理论揭示的方向，那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内国际环境都不许可。但在制定进出口战略时，把这一理论作为算经济帐的一个依据，却是可行的，必要的。特别在经营管理方面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多考虑合算不合算问题，就更为重要。当然不应单从经济上考虑合算不合算。

就我国当前外贸情况来看，我们不象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削弱他国优势，保护本国劣势作为贸易政策的核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既难很好发挥本国优势，又难很好利用外国优势的状态。把阻碍发挥生产优势与出口优势的各种因素加以剔除，把阻碍利用外国生产优势的各种因素加以剔除，从而积极参加国际分工，促进四化建设，应该是我们贸易政策的核心，也是应用“比较成本理论”，调整、改革外贸的目标。

有的同志可能认为：应用资产阶级贸易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殆不可能。列宁有段话极富有远见：“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可见，利用借鉴外国对我有用的东西，完全是必要的。对外开放政策应该也适用于这些方面。

关于对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评价问题

英国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称李嘉图为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代表”和“完成者”，同时也指出了他的阶级局限性和错误。“比较成本说”是李嘉图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后世的资产阶级学者完全割断了这个学说与劳动价值论的联系，发展了其中的庸俗因素，用来为帝国主义国际分工的剥削实质辩护。正像列宁所说，中世纪的僧侣扼杀了亚里斯多德学说中活的灵魂，而保存了其中陈腐的东西。长期以来，我们将“比较成本说”一直视作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糟粕，把孩子和脏水一齐泼掉，以致这个学说中的科学成份，湮没不彰。今天正确地重新评价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不仅有着学术上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国际分工问题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故在实践上也有重要意义。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的科学成份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並从而推导出由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产生的比较利益，揭示了两国通过分工实现这种比较利益即节约社会劳动的可能性。例如甲国许多产品的劳动生产率较之乙国都处于劣势，但甲国仍可以生产并出口那些劣势较小（即相对优势）的产品向乙国换取自己劣势较大的产品，从而节约社会劳动。这就是“比较成本说”中的合理内核。“在李嘉图那个时代，把‘比较成本说’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并进而用来说明国际贸易问题的只有李嘉图一人”（范纳：《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第490页，1937年纽约出版）。至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更是从“比较成本说”中完全阉割了劳动价值论，而代之以各种庸俗的价值理论，于是“比较成本说”中的科学成份便丧失无遗了。因为离开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出比较利益的所在，也就无从发掘“比较成本说”中的“合理内核”，即利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通过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的可能性。

当然，在肯定“比较成本说”的“合理内核”的同时，必须深入揭露和批判其庸俗的因素。第一，“比较成本说”把国际分工看作是不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自然的永恒的范畴。他把基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形成的成本差异看作是完全不依存于社会制度的一种现象，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剥削本质。第二，“比较成本说”宣扬自由贸易会导致一种各国咸蒙其利的国际分工体系。认为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使比较利益原则充分发生作用，实现对各国都有利的国际分工。李嘉图所传播的这种自由贸易福音，把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美化成为其利益能使各国一体均沾的大同世界。现代资产阶级学者正是从这方面进行发挥来为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制造理论根据。因此，我们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贸易只能意味着资本剥削的自由，意味着使发展中国家撤除保护民族经济的屏障为外国垄断资本的长驱直入和操纵控制敞开大门。李嘉图的这些庸俗因素从理论上否定了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这是我们必须通过批判予以扬弃的糟粕。

但是，我们在批判的同时也要防止走到另一个极端，像阿明在《不平等发展》（Unequal Development, 1976）、《世界规模的积累》（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74）等著作中所主张的那样，“第三世界必须‘抛弃利润规律’”，“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决裂”才算真正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脱离当前现实的“左”倾空想，它将导致闭关自守，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正确道路。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创造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以便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才能有力地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肯定“比较成本说”含有“合理的内核”决不是等于说我们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而是说马列主义的国际分工理论可以批判地吸收这一“合理内核”，正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一样。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国民经济命脉也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从建设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出发，我们认为是在外贸实践中运用比较利益的原则，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使我国的进出口结构更趋合理化，以便节约社会劳动，使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的作用不仅仅要通过进出口实现产品在物质形态(使用价值)上的转换，而更重要的是实现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果。在对外交换中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利用节省下来的劳动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这也就为对外贸易的国民经济赢利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所以要讨论“比较成本说”的“合理内核”问题的现实意义。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汪尧田

对“比较成本论”的几点看法

我对“比较成本论”研究不深，这里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与“比较成本论”

李嘉图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马克思生前虽然未完成他要写对外贸易专著的愿望，但他在《资本论》中不少地方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提出了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外贸易》中指出：在国际贸易中，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第265页）马克思还在另一处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因为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不发展，而另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末，资本家在一个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另一个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的资本。在计算两个国家之间这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第988—989页）

这里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未直接提到“比较成本论”这样的名称，但马克思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看法，不仅有着“比较成本论”一般的含义，并且包含着比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更丰富的内容。因为从以上所引用的第二段来看，马克思已经从李嘉图用劳动量单位的比较发展到对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比较，而在西方学术界直到现代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式问世，才有系统地进行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比较。

二、“比较成本论”有无实用价值

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比较成本论”只是一种对国际贸易的静态研究的方法，而国际贸易是受多种复杂因素支配的，这些复杂因素不是“比较成本论”所能解释的，因此，没有实用价值。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固然，现代的国际贸易受到政治因素，关税和各种奖出限入政策措施的影响，又受到跨国公司的垄断和操纵，往往使一国的贸易优势受到削弱，贸易利益为一方所多占或独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全部否定“比较成本论”。总的说来，

今天的世界贸易虽然受到各种干扰，但大量的贸易仍在进行。从总的方面来看，“比较成本论”以及和它有密切关系的国际价值规律仍在起着作用，它们象一种无形的手，支配着世界贸易的商品结构、地理方向和贸易规模。而且，我们目前在分析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出口产品的类型时经常使用像“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这些概念，其实，这些概念就是按照生产要素的组成情况从赫克歇尔——俄林模式中引伸出来的。可以说，在研究现代国家经济问题时，我们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比较成本论”。

实际上，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往往是按照“比较成本论”进行的。如现在一些亚洲国家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就是因为一些亚洲国家在纺织品生产上处于“较少不利”地位。中国以大米和澳大利亚交换小麦，也是同样的道理。

“比较成本论”不仅可用于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就是在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分工和交换也有借鉴作用。美国东部波士顿等城市的工业技术发展水平比西部、南部城市高，几乎在各种工业品生产上都占优势。战后以来，波士顿等城市主要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如飞机引擎等），而若干技术要求较低的产品则已转到西南部生产。目前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分工存在一些问题。像上海这类在全国具有较高工艺技术水平的城市，按照“比较成本论”应当把技术、资金和设备用来生产那些我国内地无条件生产的一些高档产品，在推销上亦应面向国际市场，而把内地有条件生产的一些中低档产品让给内地生产。这样安排会对上海和内地都有好处。

“比较成本论”不仅适用于宏观经济，即使在一些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中，往往也在有意或无意地按此行事。最近外国出版的一本有关国际贸易的简易读物中，为解释“比较成本论”而提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假设：某律师开一事务所，他在从事律师业务和打字技术上都处于“绝对优势”。最初，他一人包办事务所的法律事务和打字工作。但处理法律事务的价格高于打字的价格几十倍。最后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在两种工作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但不如雇用打字员为他打字，而让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从事收入很高的法律事务，这样在经济收入上更为有利。这个道理就是“比较成本论”。

三、“比较成本论”能否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服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对外贸易在理论上应当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如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外贸易由国家专营；根据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对外贸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实行保护贸易和贸易管制以及对外关系的五项原则；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积极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政策。这些都是根据马列主义指导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方针政策。但是，我们经营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要不要进行经济核算呢？要不要提高经营对外贸易的经济效果呢？要不要计算盈亏呢？当然是要的。“比较成本论”可以作为我们对外贸易在经济核算方面的一种参考依据，利用它为合理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检查对外贸易盈利和亏损的情况及分析其原因，研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怎样增加盈利和消除亏损，找出扩大出口和提高对外贸易经营的经济效果的途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我们利用“比较成本论”时，只是利用其合理的内核，必须摒弃其不适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糟粕。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

四、对现代外国的经济理论应当怎样看待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对现代外国经济理论能否借鉴和利用的问题。总的看法是，从生产关系来讲，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是要极大地维护其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在涉及生产关系

问题上，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是反动的，改良主义的，如鼓吹什么“人民资本主义”等等，我们应当以马列主义为武器予以彻底的批判。但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有一部份是在研究怎样在大工业生产情况下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研究如何以最小的耗费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如在经济管理科学上的投入产出法、泰勒制度、行为主义，在各个部门经济学中如农业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等大多是研究如何合理组织某一领域内的经济活动，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果的目的，对于这些，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情况下也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甚至像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如果运用到扩大出口上，研究当出口量扩大到某种规模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好处究竟会有多少，也可以有其被利用的价值。我们今天进行学术探讨，应当博采各学派之长，对任何经济理论，只要其中有任何科学的内核，有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就应当研究它。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末，对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以及现代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式，就应当持这样的态度。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相重光

赫克歇尔——俄林模式中有关发展生产要素 优势的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事物在发展变化，资产阶级国际贸易学说也在发展变化。就比较成本学说而言，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并把绝对成本说发展为比较成本说，把绝对优势发展为相对优势。他们都赞成自由贸易，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国际分工，通过国际贸易，彼此获利。有人讲，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是从生产领域，从供给方面来探讨国际贸易理论的。后来，约翰·穆勒则提出了相互需求论。本世纪三十年代，俄林的《区际和国际贸易》一书问世，它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学说又作出了新的发展。

瑞典经济学家俄林，197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师承了赫克歇尔的论点，并且加以阐述和发展，因此，这个学说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或定理)。他们认为，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各种商品的价格、供给与需求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两国间商品成本高低的不同，固然会导致价格上的差异；而商品的价格与商品的供求，生产要素的供求又是相互作用的。两国国内，各种商品的单位成本比例不同，也是导致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认为，两国间贸易的形成，一般是由于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等)的情况不同。一国拥有的某种生产要素比较丰富，那末，利用这些要素生产的产品在其国内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不同的产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比例不同，有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有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有的是技术密集型产品。他们把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联系起来，因而提出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式。这个模式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于各国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富裕的程度。因此，每个国家生产什么商品，出口什么商品，就应考虑到它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情况，也就是说，应该发挥它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优势。按照赫克歇尔——俄林模式，资本比较充裕的国家应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输入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比较充裕的国家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通过国际贸易可部分地代替生产要素的移动，弥补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缺陷。

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是从生产诸要素的角度来阐述比较成本说的。有的西方经济学者认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式对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作了更丰富的论述；有的则把它与李嘉图的学说媲美，作为生产和贸易的基本模式，把它们说成是纯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块柱石。可见，它是当代资产阶级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学说。

围绕赫克歇尔——俄林模式，西方经济学者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另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里昂惕夫运用他的投入——产出法对美国的贸易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的出口商品与它的进口商品相比，美国出口商品的劳动密集度超过资本密集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里昂惕夫之谜”。也有人认为，一种比较完善的贸易学说必须承认技术传播的作用，亦即要与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相一致等等。尽管西方经济学者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有这种那种看法，但是，他们中大多数对于这个模式还是承认的。他们认为只需作进一步的修补就可以了。

赫克歇尔——俄林模式是在一系列假定下推导出来的。我感到应当从根本上来研究它的假定的现实性。例如赫克歇尔——俄林模式的基本假定中有这样两条：如货物流通中的一切限制都不存在，这就不符合现实情况了；再如，它假定各国在生产各种商品时，所使用的生产技术是一致的，这就排除了各个国家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既然它的理论是以这些假定为前提的，那末，它的结论就必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一国出口商品结构应该体现它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优势，就这一点来看，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局 王沛春

从抽纱出口看“比较成本说”在组织优势商品出口中的作用

“比较成本说”曾被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用作制定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阐明了一个道理，即国际分工是节约社会劳动的重要源泉之一，并为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比较利益原则”。因此说，它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是含有科学成份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外贸易”一节中写道：“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从此论述看，马克思是批判地吸收了李嘉图“比较利益原则”的科学成份。

今天，我们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可以运用“比较利益原则”，多组织一些生产成本低的商品出口；还可以运用“比较成本说”具体剖析某些出口商品在生产各环节中的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扩大生产，扩大出口。下面用组织优势商品的一个实例来说明“比较利益原则”还是可以利用的。

抽纱商品，是由中央统配原料，地方农副业队伍加工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它在国内生产潜力很大，但原料供应有一定限度，过去曾进口亚麻布供加工抽纱出口。但进口麻布与国产麻布价格比较，进口高于国产。在规格、质量相同的条件下比较，进口麻布每米约合人民币4.5元，国产麻布每米调拨价1.8至2元。由于国产亚麻细布作为抽纱主要原料，成本低于国际市场现价，竞争能力较强，1980年出口金额达4亿多美元，其中麻纱比较畅销，达1,000多万吨。

可见，成本的高低决定竞争能力的强弱，生产规模的大小。据外商反映，由于南欧近几年地租、工资昂贵，亚麻布生产成本增高，由优势逐渐变为劣势，亚麻种植面积大幅度下

降。据有关资料显示，意大利 1960 年种植亚麻 12 万亩，到 1970 年只剩下 15,000 亩，下降了 8 倍。而我国亚麻重点产区由 40 万亩增加到 130 万亩。

从实践看，抽纱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量增加或缩小，是受换汇率高与低影响的。而换汇率的高与低，又是受国内生产这种商品的自然资源、初级加工、成品加工、管理水平等诸因素的经济优势与劣势决定的。因此，在国内应对抽纱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成本比较，找出优势与劣势，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形成全国的优势。

亚麻种植的自然资源优势在黑龙江。那里，地处北纬 43 度 23 分至 54 度 34 分之间，属于寒温带气候；日照长达 2,600—2,800 小时，土质肥沃，适于亚麻的生长；种植亚麻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重点产区有 46 个县，平均亩产 260 斤以上，个别县平均亩产高达 420 斤以上，而非重点产区亩产仅 150 斤左右。从经济收益比较，亚麻高于小麦。人们有个习惯的比较，叫“麦麻收”，因麦麻是在同一个季节收获，同时得到经济收益。亚麻平均亩产 264 斤，单价 0.19 元，收益 40.12 元。小麦平均亩产 150 斤，单价 0.164 元，收益 24.6 元。（亚麻历次调价，最初每斤是 0.152 元，1978 年上调到 0.19 元；小麦由每斤 0.137 元，调到 0.164 元）亚麻与小麦经济收益比较，显示出每亩亚麻比小麦多收益 15.52 元，高产地区则收益更多。因而，生产队种植亚麻的积极性较高，由 1978 年的 80 万亩到 1980 年已发展到 130 万亩。总产量占全国的 96.1%。

黑龙江还具有一定规模的亚麻初级加工优势。亚麻加工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特别是 50 年代初建设了我国独有的亚麻纺织工厂，年产值达 4,000 多万元。随之相应地建立了 14 处国营亚麻原料厂，130 余处沤制亚麻生产点。

以上说明，黑龙江地区所以能在我国种植、加工亚麻方面具备优势，是由于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有机的结合，並加以合理组织利用而形成的。

然而，亚麻种植的自然资源优势还必须与抽纱生产的技术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我国麻纱商品的出口优势。我认为，“比较成本”原理，可以作为衡量与判断国内各地区抽纱商品出口换汇率高低的一把尺子。

各地区抽纱商品出口换汇率比较表 (1980)

地区别	收购金额(人民币) 万 元	换汇额(美元) 万元	换汇率
上 海	29,709	15,100	2 : 1
山 东	18,000	8,000	2.2 : 1
广 东	22,000	8,400	2.6 : 1
福 建	1,800	650	3 : 1
北 京	6,885	2,000	3.4 : 1
天 津	4,495	1,100	4 : 1
黑龙江	400	100	4 : 1

从上表看出，上海、山东、广东的换汇率最佳，比黑龙江、天津等地则高得多，国家应当把统配的亚麻布原料调给这些省市，发挥其加工抽纱的技术优势，生产出质量高、成本低、换汇合算又受国外欢迎的抽纱商品出口，扩大销路，反过来促进黑龙江的亚麻种植、加工的优势。但目前，有些地方不进行成本比较，盲目发展抽纱，使国产原料供应紧张，争购原料，使其价格上涨了 20% 至 30%，绣花工价提高了 30% 左右，使出口成本加大，造成劣品

积压，外贸亏损，严重地破坏了各自优势的发挥。为了保证抽纱商品出口优势，应当把国内各生产环节的最佳优势都集中起来，加以合理组织分工，这样才能形成出口的经济优势，得到最佳经济效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对某些出口商品可以运用“比较成本说”进行剖析，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提高经济效果，为国家创造更多外汇，为加速四化建设提供资金是有一定作用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杨湛林

“比较成本说”不是发展对外贸易的依据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比较成本说作为国际分工的一个理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不是由于国际分工，也不是由于生产成本的差异，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即剩余价值的规律。这就是列宁所指出的：(1)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2)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均衡地发展着，而是互相超越着，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3)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资本主义企业的这种趋向必然要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寻找国外市场。

实践也证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按比较成本说发展对外贸易。英国是最早实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当英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德国和日本还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生产成本低。可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根据比较成本，以生产成本低的产品去交换工业国的工业品，而是利用保护关税加快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比较成本说产生于英国。英国也没有按比较成本说发展对外贸易。最初英国的棉纺织工业落后于古老的中国和印度。按照比较成本说，英国以进口棉纺织品为有利。可是，产业革命后，英国棉纺资本家扩大固定资本投资，对棉纺织工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终于打垮了中国、印度的棉纺织工业，把它的棉织品推销到世界各地。

以上两个例子是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情况。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情况又怎样呢？第一，由于竞争激化，一些国家的垄断组织用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对外倾销商品，夺取市场后再提高价格，以弥补因倾销而遭受的损失。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倾销和反倾销成了普遍现象。1978年，美国曾制订“钢铁基准价格”制度，以限制外国钢铁进口。这一制度以钢铁生产成本最低的日本钢铁价格为基准，加上运费，低于这一价格的作倾销处理，征收反倾销税。第二，由于技术进步，商品性能成了非价格竞争因素。近年来，日本汽车大量输往美欧各国。1980年，在美国市场上占21.3%，在英国市场上占12.3%，在西德市场上占10.3%，在丹麦市场上占31%。日本汽车能够大量输往美欧市场，性能问题是有力的竞争因素之一。日本汽车体积小，省燃料，少故障，故为美欧各国人民所喜爱。因此，尽管日元在1977、1978年不断升值，但日本汽车出口贸易并没有受到影响。在日本汽车的攻势下，美欧各国汽车工业受到很大打击。这些国家并不象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停止生产汽车，而是一方面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限制日本汽车进口，另一方面改组汽车工业，准备生产小型汽车，以提高性能，加强竞争能力。

上述情况说明，发展对外贸易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较成本说不是发展对外贸易的依据。

“比较成本理论”对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现实意义

“比较成本理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而提出来的一项国际贸易原则。它适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起过並仍在起着积极的作用。那末，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不是也适用呢？

我认为“比较成本理论”含有科学的内容，因为它在客观上是符合价值规律在国际商品流通中的作用的。在各个国家之间，由于地理、气候、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生产同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不会相等的，因而形成这种商品在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国别价值；但从全世界来说，一种商品只能有一个价值，即国际价值，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的国际价值与国别价值的差异，这正象在一国之内商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异一样。技术水平较高、经济比较发达或具有生产经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或传统产区，它生产这种商品的国别价值总是低于国际价值，从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相反的国家或地区，它生产这种商品的国别价值总是高于国际价值，从而不能取得较多利润，甚至还会亏损。因此，从一个国家来说，它总是要生产对自己最有利的商品（即花费劳动最少而经济收益最大的），发挥自己生产上的优势，以此去交换那些自己生产最不利的商品。这正是价值规律对国际商品流通的作用的一种表现。李嘉图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比较利益原则，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这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原理的，因而是有科学的成份的。

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参加国际商品流通，她同样要受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她也应该考虑比较利益原则。例如我国有许多沙地、盐碱地，这些土地种粮食的产量很低，如山东、河南的一部分地区粮食亩产只有200-300斤，低的还不到100斤；而种花生、向日葵等油料作物则产量一般较高，花生亩产可达300斤，高的500斤，按照现在国际市场价格计算，种植一亩花生的收入可相当于小麦1500斤。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地区是种植粮食，搞自给性生产好呢，还是种植花生、向日葵，发展对外贸易，搞商品性生产好？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后者。这就是发展对外贸易对促进国内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大力组织生产和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商品，去换取那些自己生产不大有利的商品，这样做，对国际贸易的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现阶段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比较有利的，当然同时也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通过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完全来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保障政治安全 and 经济利益，我国也要建立独立自主的、门类齐全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这並不排斥我国对外贸易应有很大的发展。因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当然，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也存在严重的缺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李嘉图对商品价值形成的论述是不科学的，没有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始终；其次，这一理论强调了国际分工，如果单纯地实践它，会造成一国在经济上的片面化发展，不利于国家的政治独立；再次，这一理论有利于掩饰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掠夺，搞不等价交换，妨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中，不能脱离具体条件，片面地强调“比较成本理论”。在我国，运用比较利益原则应该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前提。